

南朝龕像遗迹初探

宿白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魏晋佛教依附玄谈,为士大夫所激赏。东晋南迁,佛教玄风传布江左,高僧名士共入一流。名士多出世家,或为世家所敬重,所以,此时长江中下游佛教主要盛行于上层。十六国时,中原北方善谈名理仍是僧人主流,道安、罗什皆擅文辞,重义学,故后秦姚兴称奉佛教为“好乐玄法”(《广弘明集》卷十八《重答安成侯姚嵩书》),道安、罗什之译经宣讲,其影响亦远布南方。因此,五世纪初期以前南北佛教无大差异。413年,罗什卒后不久,关中战乱,罗什徒众率多南下。418年,赫连勃勃灭佛;444年,北魏太武毁法,义学高僧更相继南游。沿袭中原重义理、尚谈论风气之江南佛教,浸假衍为虚幻世界之祈求,传播始广;北方于文成复法(453年)之后,统治者大开窟像,提倡德业,释门徒众为求自身解脱,益重禅观,南北佛教乃形分途。重义理、尚谈论,不重苦修,因而江南佛寺以兴建巨构为主,少凿窟龕,郭祖深上书梁武帝云:“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南史》卷七十《循吏·郭祖深传》),皆指地上所营寺院而言,而开龕雕像终东晋南朝二百六十余年(317—580年),较重要的遗迹现仅知建康摄山和剡溪石城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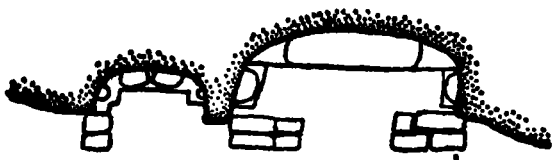
摄山遗迹,本世纪二十年代向觉明先生曾三次调查,撰有《摄山佛教石刻小纪》、《摄山佛教石刻补纪》¹⁾。石城遗迹,日人小野胜年于1975年撰《浙江剡县の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1984年又补缀成《新昌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²⁾。两先生大作皆参照历代记录,对现存遗迹作了较详细的论述³⁾。本文以研读上述论著为起点,重检文献,再核遗迹,考述两处龕像年代,结合魏晋以来中原北方的佛教情况与有关遗迹,对南方佛教信仰和龕像来源与影响等问题,试作一次初步的整理和推测。定稿仓促,难免疏误,希望留意佛教遗迹诸同志不吝指正。

- 1) 《摄山佛教石刻小纪》刊《东方杂志》第23卷8号(1926年),《摄山佛教石刻补纪》刊《东方杂志》第26卷6号(1929年)。两文皆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
- 2) 《浙江剡县の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刊《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历史编》,山川出版社,1977年。《新昌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刊《佛教艺术》163号,1985年。
- 3) 除两先生文章外,应予注意的实况记录文字,尚有1919年日人关野贞《西游杂记·摄山横置寺南朝石窟》,该文后收入《支那の建筑と艺术》,岩波书店,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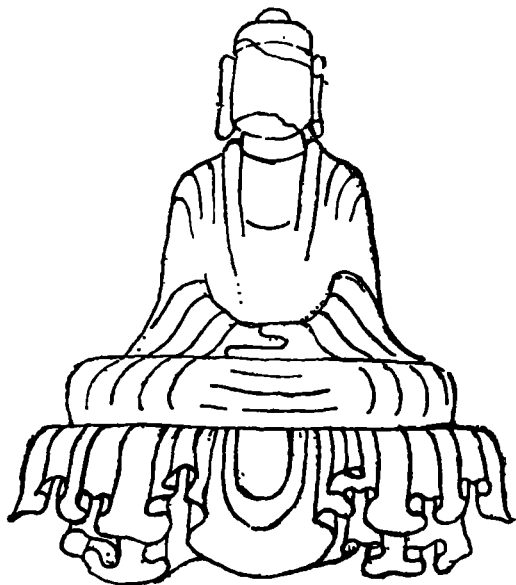
一、南朝两处重要的龕像遗迹

(一) 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龕像

建康摄山遗迹,即今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其地遍布大小龕像,其中规模较大、造像尚可窥识南朝形制者,有大龕和次大龕各一(图一)。两龕毗连,左侧者为大龕,平面略作横椭圆形,无前壁,龕顶前部坍塌,现存明代补砌砖顶和重檐砖石门壁,下檐下券门上方嵌“三圣殿”石额。龕壁上端有梁孔遗迹,知在砌建石顶、门壁之前,接连岩面曾建有木构。龕内沿壁雕出石坛,坛正中铸禅定坐佛,高约六米(图二),坛前方两侧各雕一立于重瓣莲台上的胁侍菩萨。三像虽屡经后世妆奁,但姿态、服饰旧迹犹可仿佛。坐佛垂下的衣袂和菩萨裙饰下部向外撇开的形式,皆与河南洛阳龙门公元500—523年雕凿的宾阳洞形象相似。栖霞此龕,一般都认为是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



图一 南京摄山龕像平面示意图
(1963年速写)



图二 南京摄山无量寿龕内的无量寿佛石像
(1989年速写)

碑》所记齐明僧绍子仲璋与法度禅师铸造的无量寿佛并二菩萨所在龕。《江总碑》记此事始末云:

“南徐州琅琊郡江乘县界有摄山者,其状似伞,亦名伞山。尹先生记曰:山多草药,可以摄养,故以摄为名焉……齐居士平原明僧绍空解渊深,至理高妙,遗荣轩冕,遁迹岩穴。宋泰始中(465—472年),尝游此山,仍有终焉之志。乃刊木驾峰,薙草开径,披拂榛梗,结构茅茨。廿许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扰篋无立,皆曰诚至所感。有法度禅师,家本黄龙……与僧绍冥契甚善,尝于山舍讲无量寿经,中夜忽见金光照空,光中如有台馆形象……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489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居士尝梦此岩有如来光彩,又因闲居依稀目见,昔宝海梵志睡觀花台,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知神应非远,灵相斯在。居士有怀创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为临沂令,克荷先业,庄严龕像,首于西峰石壁与度禅师铸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图写瓌奇,刻削宏壮,莲花莹目,石镜沈晖,藕丝紫发,云崖失彩。顶日流影,东方韬其大明;面月驰光,西颯匿其成魄。大

同二年¹⁾，龕頂放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絕若火殿。禪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497年）于此寺順寂。豈非六合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舍泉貝，共成福業”²⁾。

江總，陳太建四年（582年）至禎明二年（588年）間，曾多次游憩攝山栖霞寺，并有詩紀事³⁾。此碑之撰，或即此時。其后，唐上元三年（676年），高宗立《攝山栖霞寺明征君碑》亦記此龕像云：

“南齊征君明僧紹者，平原人也……齊建元元年（479年）又下詔征為散騎侍郎，又不就……遂屆南京，負杖泉邱，游睨林壑，歷觀聖境，行次攝山，神谷仙岩，特符心賞……有終焉之志……永明元年（483年）又征為國子博士，征君隱居求志，義趨于由光；不降凝心，迹高于園綺。凿坏貞遁，漱石忘歸。鶴版載臨，豹姿逾遠。俄有法師僧辯承風景慕，翼徒振錫，翻然戾止……因即鄰岩構宇，別起梵居，聳峽飛柯，含風吐霧，栖霞之寺由此創名……頃之，辯師仙化……征君積緣登妙，至感入微，嘗夢法身冠于層嶽……又觀其顏于岩之首……于是拜受嘉征，愿言經始，將于岩壁造大尊像，乃眷為山，未遑初策，遽而西川智士與曉岳而俱傾，東國高人隨夜星而共沒。瑤瑤落彩，峰岫沉暉，永明二年（484年）奄遷丹壑。第二子臨沂公仲璋，顧慕層崖既崩，心于岵望，徘徊曩構，更泣血于楹書，遂琢彼翠屏，爰開蓮座，捨茲碧題，式建花宮。上先仇填之區，仰鑠能仁之像；校美何充之宅，遽崇崇德之闈。遂彼肖宗，大宏釋典。文惠太子及竟陵王或澄少海之源派，朝宗于法海；或茂本枝之穎發，萌栝于禪枝。咸捨淨財，光隆慧業。時有沙門法度，為智殿之棟梁，即此舊基，更興新制，又造尊像十有余龕”⁴⁾。

據兩碑所記，知栖霞建寺創于高士明僧紹與僧辯法師⁵⁾，開龕造像則始于明僧紹和法度禪師之設計⁶⁾。永明二年（484年）明僧紹卒，其時窟像雖“有懷創造”，“乃眷為山，未遑初策”。其后，僧紹子仲璋與法度經營雕造，并得齊文惠太子、豫章、竟陵、始安諸王之助，始“光隆慧業”。《江總碑》云，法度卒于建武四年（497年），慧皎《高僧傳》卷八《法度傳》則記“齊永元二年（500年）卒于（攝）山中”，而贊成其事之齊室貴胄：文惠太子長懋卒于永明十一年（493年）、豫章王嶷卒于永明十年（492年）、竟陵王子良卒于隆昌元年（494年）、始安王遙光卒于永元元年（499年）⁷⁾，皆歿于法度之前，因知此攝山無量壽佛及二菩薩龕像之凿鑿，在永明二年以后，建武四年

1) 大同二年（536年）尚在下文建武四年（497年）法度禪師逝世之后。疑有訛誤。

2) 據嚴觀《江寧金石記》卷一錄文。該錄文后，嚴跋云：“右碑，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參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濟阳江總持撰。陳朝前會稽王行參軍京兆韦霈書。此碑經唐會昌時毀廢后已曾重立，至宋復斷。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十七日僧契先復依旧本鑄立，始得傳至今日。前列款云：‘宋賜紫沙門怀則重書，賜紫沙門有朋篆額。’”

3) 《陳書》卷二七《江總傳》錄其自叙云：“弱歲歸心釋教……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更厲練戒”。江詩見錄于《廣弘明集》卷三十。

4) 據《江寧金石記》卷二錄文。嚴附跋云：“右碑在棲霞寺。高宗御制文，朝儀郎行左金吾衛長史侍相王府臣高正臣奉勅書，朝散大夫守太子洗馬王知敬篆額，上元元年歲在景子四月戊戌朔廿五日壬戌建”。

5) 僧辯法師與法度“并研精經論，功業可稱”，見《高僧傳》卷八《慧隆傳》。

6) 《法苑珠林》卷三六引《梁京寺記》記明僧紹建寺與法度事迹云：“齊棲霞寺在南徐州琅玕郡江乘北鄉頻佳里攝山之中。齊高士平原明僧紹以宋太始中（466—471年）起造，嘗聞法鐘自响。山舍去村五六里，宋昇平中（477—497年），村民平旦并見半山有旛蓋羅列，烟光五色，映照虛空，男女瞻望，皆言是實，就來觀視，了无所見。時有法度法師于山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寺，于其光中如有台館形像弘宣。寺中僧眾及淨人等小不如法，及白衣賓客有秽濁入寺者，虎即出現吼叫巡房，响振山谷，至今犹尔。或有念誦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繩索，僧眾惊惧，誦習不懈”。

7) 以上諸人卒年，俱見《南齊書》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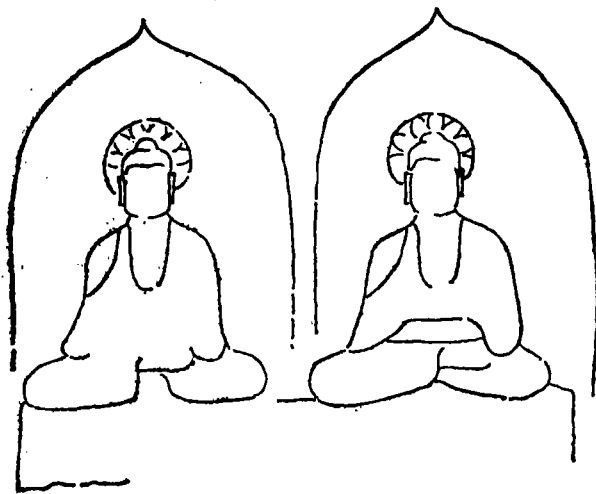
或永元二年之前，即五世纪末期。此像，《江总碑》又记梁天监十年（511 年）临川王宏曾加莹饰：

“梁太尉临川靖慧王道契真如，心宏檀蜜，见此山制置疎阔，功用稀少，以天监十年八月爰撤帟藏，复加莹饰。纒以丹青，鏤之铁鏤，五分照发，千轮启焕……慧振法师志业该练，心力精确，度上人将就迁神，深相付嘱。法师率修厥绪，功助众功，基业田园多所创置”。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收《法苑杂缘原始集·杂图像目》卷下著录之《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龕大石佛记》，应即是详述此段因缘者。《高僧传》卷十一《僧祐传》记：“光宅、摄山大像……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亦应指经始临川王之莹饰事，与开龕造像无涉。又宝唱《比丘尼传》卷三《建福寺智胜尼传》记：

“永明中（483—493 年）……（智）胜捨衣钵为宋齐七帝造摄山寺石像”。

不知与此龕像有关否？如指此像，则齐时赞助镌雕不仅诸王贵胄，且有女尼；而铸造大像之目的，亦兼有为宋齐七帝普作功德之意。



图三 南京摄山释迦多宝龕内的石像
(1963 年速写)

栖霞无量寿佛大龕右侧紧邻一次大龕，平面亦略作横椭圆形，无前壁，龕内凿出平面呈“口”形石坛，坛正面雕释迦、多宝并坐像，两侧面各立一菩萨。释迦多宝皆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项光中雕莲座，身光高宽和光中文饰均漫漶不可辨（图三）。值得注意的是，释迦、多宝两像右肩有明显之弧形饰线。此种饰线在中原亦见于龙门宾阳洞和巩县第一、二、四窟。此龕既毗连上述无量寿佛大龕，形制又相似，可

知两龕开凿时间当亦相距不远，前引《高宗碑》记“沙门法度为智殿之栋梁，即此旧基，更兴新制，又造尊像十有余龕”，因疑此龕或即法度另造之“尊像十有余龕”之一。

此外，两龕附近，崖壁遍布历经妆奩的小龕像¹⁾，可略窥其原来形像者，有坐佛龕、倚坐佛龕、千佛龕和思惟像龕，值得注意的其中有三坐佛龕和右袒服饰坐佛龕，此诸龕像属于早期雕造者，除有可能为法度所造者外，还当有《江总碑》所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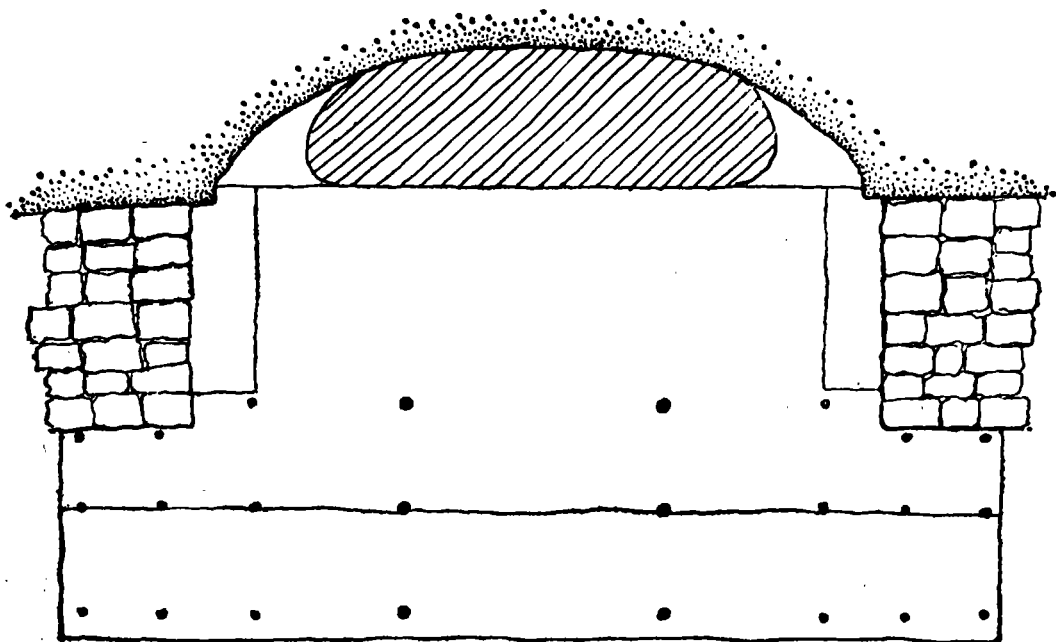
“宋太宰江夏王彞姬蕃国内德、齐雍州刺史田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见，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抽财施，琢磨巨石，影拟法身”。

1) 1925 年，向达先生曾作统计，据云摄山千佛岩“共计石窟佛龕大小才二百九十四，造像大小五百十五尊而已”。见《摄山佛教石刻小纪》。

之遗迹¹⁾，因此，此批小龕像中应有早于上述两龕者，唯形像漫漶，又多后世修饰，其详已不可考²⁾。

(二) 浙江新昌宝相寺龕像

浙江新昌宝相寺龕像即刻溪石城山遗迹。该龕形制与栖霞无量寿佛大龕类似，平面亦略作横椭圆形，露顶，敞前壁，龕前接连木阁³⁾(图四；图版壹，2)。龕内正面凿佛座，上雕大型佛像一躯。佛像全部贴泥饰金，原状已掩。现像作禅定结跏趺坐式。据新昌县保管所实测，座高 2.4 米，坐像身高 13.23 米(图五；图版壹，1)。该龕像初竣时，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详记其事。碑石北宋时尚存⁴⁾，熙宁四年(1071年)孔延之以尚书司封郎中知越州，明年辑



图四 新昌石城宝相寺弥勒大佛龕像附前接阁殿平面示意图

(1989年速写)

(图中部为龕前接建阁殿，下方是廊)

- 1) 明人多谓此诸小龕为自齐竟陵以后所雕造。参看《摄山志》卷五所辑明姜宝、冯时可、王士禛、吴士杰诸人游记。
- 2) 摄山早期铭记，前南京古物保存所曾拓得梁中大通(529—534年)一段，见《摄山佛教石刻小纪》补注(一)。1927—1928年，向先生再游摄山，因拓工李祯祥指示，知此铭记为中大通二年(530年)，刻于无量殿东一龕上，见《摄山佛教石刻补纪》。1935年，马衡先生游摄山，亦发现此铭记，马氏《金石杂记》云：“于残像之侧，搜得梁时题记，不知昔之访古者何以忽之”。马文收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
- 3) 龕前木构，梁以后屡次重修。现存五层木阁系1917年建。
- 4) 《民国新昌县志》卷十六《金石》记此碑久佚，有“明刻石亦碎”，“清嘉庆间(1796—1820年)，涂鸿占真书，又毁于发匪。碎裂之石堆置墙阴，流传亦少”。

碑文于《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兹择录如下¹⁾：

“夫道源虚寂，冥机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匠(德)思其契。是以四海将宁，光(先)集(入)威(感)凤之宝；九河方导，正致应龙之书(画)。况种智圆照，等觉偏知，扬万化于大千，擒(擒)亿形于法界。当其云(灵)起，摄诱之权，影现游(戏)戏(游)之力，可胜言[者]哉……观夫石城初立，灵证发于草创，弥勒建像，圣验显乎镌刻……始有昙光比丘雅修远离，与晋世于兰同时并学，兰以慧解驰声，光以禅味消形影，历游岩壑，晚届剡山，遇见石室，班荆宴坐……后见山祗盛饰，造带讵谈，光说以苦谛，神奉以崖窟，遂结伽蓝，是名隐岳。后兰公创寺，号曰元花……又光公禅室，耳属东岩，常闻絃管，韵动霄汉……由是兹山号为天乐。至齐永明四年(486年)，有僧护比丘，刻意苦节，戒品严净，进力坚猛，来憩隐岳，游观石城……削成青壁，当于前嶽。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克勤心力，允集勋助，疏凿积年，仅成面璞……后原燎及岗，林焚见石，有自然相光正环像上，两际圆满，高焰峰锐，势超匠楷，功逾琢磨，法俗悚心，邑野惊观，金曰冥造，非今朝也。自护公神迁，事异人谢，次有僧淑比丘纂修厥绪，虽劬劳招奖，夙夜匪懈，而运属齐末，资力莫由。千里废其积跬，百仞亏其复篲。暨我大梁受历，道铸域中……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道性自凝，神理独照……有始丰县令吴郡陆咸，以天监六年(507年)十月二十二日，罢邑旋国，夕宿剡溪，值风雨晦冥，惊湍奔壮，中夜震惕，假寝危坐，忽梦沙门三人乘流告曰：君识性坚正，自然安稳，建安王感患未痊，由于微障，剡县僧护弥勒石像若能成就，必获康复，冥理

非虚，宜相开导。咸还都经年，稍忘前梦。后出门，遇僧云听讲寄宿，因言去岁剡溪风雨之夜，嘱建安王事犹忆此否。咸当时抚然，答以不忆。道人笑曰：但更思之……咸霍尔意解……遂用腾启，君王……乃开藏写贝，倾邸散金，装严法身，誓取妙极。以定林上寺祐律师德炽释门，名盖净众，虚心弘道，忘己济物，加以贞鉴特达，研虚精深，乃延请东行，凭委经始，爰至启教，专任像事。律师应法若(似)流，宣化如阳(渴)，扬船(舡)浙水，驰锡禹山，于是，扞虚梯汉，构立栈道，状奇眩之飞车，类仙(似)腹(叟)之悬阁，[体]高阒图范，冠彩虹霓。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于云表，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也。初护公所镌，失在浮浅，乃铲入五丈，改造顶髻，事虽仍旧，功实创新。乃岩窟既通，律师重履方精成像躯，妙量尺度，时寺僧慧暹梦黑衣大神翼从风雨，立于龕前，商略分数。是夜将旦，大风果起，拔木十围，压坏匠屋，师役数十安寝无伤，此及诘朝，而律师已至，灵应之奇，类皆如此。既而谋猷四八之相，斟酌八十之好，虽罗汉



图五 新昌石城宝相寺弥勒大佛现状
(据 1987 年劳伯敏照片摹绘)

之三观兜率，梵摩之再胡法身，无以加也。寻岩壁缜密，表里一体，同影岫之缥章，均帝石之黜色，内无寸隙，外靡纤瑕。雕刻右掌，忽然横绝，改断下分，始合折中，方知自断之异，神匠所裁也。及身相克成，莹拭已定，当于万字，信宿隆起，色似飞丹，圆如植壁，感通之妙，熟可思议，天工人巧，幽显符合，故光启宝

1) 刘勰碑文，《艺文类聚》摘要录入卷七六“内典”上，题曰“梁刘勰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文字与《会稽掇英总集》略异，现并附录于下面引文中：异文括在()内；增文括在[]内；缺文匡在□中。《总集》用四库本，《类》用中华排印本。

仅，发挥胜像。磨砢之术既极，绘事之艺方骋……青囊与丹砂竞彩，白盃（金）共紫钺争耀（辉）。从容满月之色，赫奕烈日之辉……可使曼随逆风而献芬，旃檀随云而散馥，梵王四鹤（鹤）徘徊而不去，帝释千马踟蹰而忘归矣。初隐岳未开，野绝人迹，及光公驯虎，时方雨雪，导迹污涂，始通西路。又东岩盘郁，千里联嶂，有石牛屈止，至自始丰，因其蹄涔，遂启东道。寻石牛通险，不资蜀丁之力；文虎标径，无待为人之威，岂四天驱道，为像拓境者欤。以大梁天监十有二年岁次鹤尾（513年）二月十二日开凿爰始，到十有五年龙集君滩（516年）三月十五日妆画云毕。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五尺，从地随金光焰通高十丈。自涅槃已后一百余年，摩竭提国始制石像，阿育轮王善容罗汉，检其所造，各止丈六，鸿姿巨相，兴我皇时，自非君王愿力之至，如来道应之深，岂能成不世之宝，建无等之业哉。窃惟慈氏鼎来，拯斯忍刹，惟我圣运，福慧相符，因知邈城合契于今晨，龙华匪隔于来世，四藏宝奇可跣足而献，三会甘露可洗心而待……仍作颂曰……释尊隐化，慈氏现力，复哉往缘，越矣来际，求名受别，无垢立誓……一音阐法，三会入道……仪彼旃檀，像兹宝石，五仞其广，百尺其表，金颜日辉，紺螺云复……梵释爰集，龙神载聘……刹尘斯仰，邈劫永承”。

《高僧传》卷十三《僧护法》亦记此事，可补《刘龔碑》者，录如下：

“释法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苦节，戒行严净。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丛树，曲干垂阴。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誓发宏愿，愿博山铸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齐建武中（494—497年），招结道俗，初就雕镌，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遭疾而亡。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其愿克果。后有沙门僧淑寡妻遗物，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天监六年（507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威罢邑还国……（翌年）威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僧祐律师专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谓充遍，抽舍金贝，誓取成毕……初僧护所创，凿窟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夜中忽当万字处，赤色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监十二年（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层台¹⁾，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自像成之后，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复。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此后，隋柳惔和唐初道宣皆记录此像。《国清百录》卷四录柳顾言《智者禅师碑》有云：

“剡东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缯石像，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铸佛，自有灵迹”。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云：

“有梁佛像多现神奇，剡县大石像者，元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昙光禅师从北来，巡行山川为幽栖之所，见此山崇丽，乃于峰顶构小草堂，空中闻天乐声曰：此是佛地，如何辄有蔬圃耶。光闻之，南移天台，后遂增造为佛像，积经年稔，终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惠，降梦能引剡县石像病可得愈。遂请僧祐律师既至山所，规模形制，嫌其先造太为浅陋。思绪未绝，夜忽山崩，其内佛现，自颈以下犹在石中，乃铲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讫，乃具相焉。斯则真仪素在石中，假工除铲故得出现。梁太子舍人刘龔制碑于像前耳”。

综上记录，知剡溪胜境自于法兰创佛寺、昙光建禅室以来，渐聚释众。齐永明四年（486年），僧护来游，见寺北青壁有如佛焰之形，因发愿“敬拟千尺弥勒之容”，建武中（494—497年），始招结道俗，开始雕造，“疏凿积年”，既“失在浮浅”，又“仅成面朴”。继有僧淑续业，因资力莫由而

1) 《刘龔碑》记：“绘事之艺方骋……青囊与丹砂竞彩，白盃具紫钺争耀”，可推知大像原施金彩，施彩之像不宜露天，“龕前架三层台”，当设有屋檐。《文苑英华》卷二三四录盛唐诗人孟浩然“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诗：“石壁开金像，香山绕铁围，下生弥勒见，迴向一心归，松竹禅庭古，楼台世界稀”，所咏之楼台，疑即指此三层台而言。《嘉泰会稽志》卷八记：“新昌县宝相寺……弥勒像……身高百尺……唐会昌五年（845年）建三层阁”，当是因旧迹重修者。

未果。梁天监七年(508年)始丰令陆咸启建安王伟,述该像灵异事,伟即以上闻,因敕僧祐重新经营,深雕形象,妆画金彩,并即龕前架三层台,“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刘勰与僧祐关系密切¹⁾,其制碑于像前,亦当在规划之内。至于“抽舍金贝,誓取成毕”者,则建安王伟,故柳留谓“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铸佛”。南平元襄王即建安王伟,天监十七年(518年)三月丙申所改封,事见《梁书》卷二《武帝纪》中²⁾。此像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僧辩端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详述其尺寸,《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九录该记全文云:

“剡溪之东三十里而远,属新昌县。有石城曰隐岳,实天台之西门,去县五六里而近。双峦骈耸,状犹琢削,其表无瑕隙,而草树不得植;虚其中无翳隘,而虎豹不得入。豁然若堂奥,窅然若龕室,诚造物者独有意于是焉。其左右前后皆圆岑峙峰,胥以环卫。案刘勰旧记,当永明四年有浮屠氏,厥号僧护,尝兹矢誓,期三生恭造弥勒之像,梁天监十二年二月始经营开凿之。洎毕:龕高一十一丈,广七尺,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广五丈有六尺;其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从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威壮丽特殊,其四八之相罔弗毕具。咸平五年端东游天台,路径是岳,故得雄观其敞博崇伟,且叹仰之不暇,谅嘉陵并郡石像³⁾外至于斯,天下鲜可比拟者。乃询其数量之延袤,刊之于石,以垂坚久,庶传于四方之耳目,俾洽于闻见也。若其神异之感召,事物之奇胜,悉存诸刘公之文,此不当复有说矣。时皇宋咸平壬寅记”。

按《刘勰碑》、《高僧传》和辩端《量记》所记大像形象,俱与今像有别:(1)计量高度,碑、传记录之尺寸容有夸张,但皆分“坐高”、“立形”两项,则为今像所不解。碑、传云前者高五丈;后者《刘勰碑》云:“立形足至顶十丈”,又云“从地随龕光焰通高十丈”,是十丈云者,系指从足至顶之光焰尖端而言。今像为跏趺坐,何来立形?且跏趺坐像亦不便从足测其高度。(2)记录右掌与足,《刘勰碑》云:“雕刻右掌,忽接横绝,改断下分,始合折中”,今像作双手相迭之禅定相,两掌之间无深缝罅,似无强调“改断下分,始合折中”之必要;《量记》又详细指掌长宽,并云:“足亦如之”,今像足掩于袈裟之内,何以测其尺度。(3)万字隆起,《刘勰碑》云:“当于万字,信宿隆起,色似飞丹,圆如植壁”,《高僧传》云:“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如此瑞迹,不见于今像。以上三项,最后之万字隆起,犹见于《民国新昌县志》卷首《南明山图》中,知为晚近新妆所掩;但前两项却涉及原像造型是否与今像相同的问题。《刘勰碑》记此像“释尊隐化,慈氏现力”、“一音阐法,三会入道”、“三会甘露可洗心而待……龙华匪隔于来世”,《高僧传》亦云:“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知石城大佛为弥勒成佛龙华遍度之像。《名僧传》记宋龙华寺道矫“元嘉

1) 《梁书》卷五十《文学·刘勰传》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部所定也……勰为文专长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展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剃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定林即僧祐投法处,造立经藏即据祐所搜杖之卷轴,天监十七年(518年)僧祐卒,勰又为之制碑文,俱见《高僧传》卷十一《僧祐传》。

2) 《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南平元襄王伟传》:“(天监)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

3) 嘉陵并郡两像皆倚山雕造之倚坐佛像,嘉陵即今四川乐凌云寺大佛,该像唐开元元年(713年)创建,贞元十九年(802年)竣工,身高58.7米(据1986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近景摄影实测)。并郡系指北齐所建晋阳西山大佛,详见本文三、《南朝龕像与北齐龕像》。

十六年(439年),罄率衣资,开诱闻业,与建康民朱舛孙共起佛殿三间并诸花幡,造夹学弥勒佛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神仪端严,开发信悟”,而传世唯一的梁铸弥勒佛像——普通六年(525年)公孙伯城夫妇造弥勒铜像,亦正作倚坐形像¹⁾。因可怀疑此像原亦雕作倚像,故可从足起上测其高度,“立形”云者即指倚坐之形而言。倚坐佛像右手多作上举扬掌之施无畏印,《刘勰碑》记此像“雕刻右掌,忽接横绝”,约即指施无畏印之手掌下缘适当崖石横断之处,其位置亦恰与“改断下分,始合折中”相符合。至于改变此像原雕形态,似始于北宋辩端之前,《量记》记“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已是改后之坐像形式。《万历新昌县志》卷三《杂传志·寺》记:

“后梁开平中(907—911年),吴越王钱鏐赐钱八千万贯,造阁三层,东西七间,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宝巨万,建屋三百余楹。后鏐之孙叔,又列二菩萨夹侍阁前,身高七丈”。

易倚坐为坐像或出于吴越钱氏之重修?《量记》于详述指掌长广之后云:“足亦如之”,可知辩端所见亦与隐足不露之今像有异,是该像之膝上部分,宋以来又有所改变。又或据《刘勰碑》“冠彩虹霓”一语,疑原像当有冠饰²⁾,按碑文又云:“自然相光,正环像上”,是“冠彩虹霓”者,应解作对项光之描述,即项光有若虹霓之彩冠;所以,其后碑文又记“改造顶髻”,如弥勒着冠,将无法窥其顶髻,遑论改造。又碑末颂文曰:“紺螺云复”,知此弥勒不仅无冠,且作紺色之螺髻。前云“改造顶髻”,后云“紺螺云复”,盖僧护所雕系如摄山无量寿之“藕丝紫发”,僧祐则易之以紺螺³⁾。齐梁间,佛发样式的变化,不独江左如此,同属南朝之四川所出石像亦然⁴⁾。

宝相寺龕像之西北,有左右毗连之大小岩洞各一。两洞壁面俱雕千佛。大洞沿后壁正中雕释迦坐像,该像右侧列千佛六区,左侧列千佛四区。两侧千佛每区纵排十小龕,横列十一小龕,每区正中约占九个小龕的位置雕一大龕,此大龕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大小龕内坐像多着通肩服饰。左右千佛之外侧,各雕护法像(图六、七)。右者右手持金刚杵(?),左者右手拄剑,两护法头部均不存,腹部与上肢的大部分亦残毁,以现存简洁的颈饰、飘扬的帔帛和下裙之襞纹等遗迹观察,皆与北魏迁洛(494年)前后的造像相类似。因此,新昌千佛雕造的时间,似应在齐武永明之末迄建武之初,即略早于僧护开始经营之弥勒大佛。

1) 参看日人大村西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164页,佛书刊行会,19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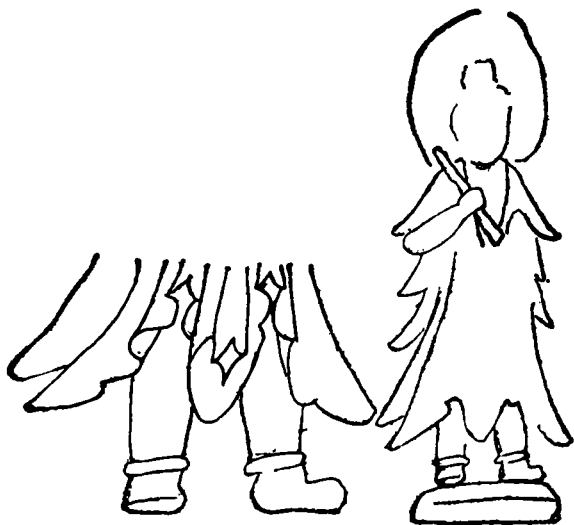
2) 参看《浙江剡县之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

3) 螺发是自中印度南传佛像之特征。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与海南诸国交往梁时最盛,《梁书》卷五四《海南诸国传》记扶南“天监二年(503年)……遣使送珊瑚佛像”,……十八年(519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又记丹丹“中大通二年(530年)……遣奉牙像”。值得注意的是《海国诸国传》又记:“大同五年(539年)……诏遣沙门释宝云随(扶南)使往迎之(佛发)。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紺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麤形。案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昔在官汭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之右旋,还成盖文。则与高祖所得同也”。此事疑与梁改佛发作螺状有直接关系。梁武改造阿育王寺塔事,又见《法苑珠林》卷三八:“梁祖普通三年(522年)重其古迹(昔秦王游鄞县,下真舍利起塔,其塔在铁围山),建木浮图、堂殿、房廊,周环备满,号阿育王寺,四面山绕,竹林葱翠,花卉间发,飞走相娱,实闲放者之佳地也。有神颂之,著作郎顾胤祖文”。普通三年上距此弥勒大像完工之日(516年)仅六年。

4) 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版8著录之中大通元年(529年)释迦立像,又图版40所录之佛头亦梁时雕造。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图六 新昌石城千佛院大岩洞中左侧护法像
(1989 年速写)



图七 新昌石城千佛院大岩洞中右侧护法像
及其下部裙摆
(1989 年速写)

二、南方无量寿与弥勒信仰的传布及相关问题

(一) 无量寿与弥勒信仰在南方的传布

摄山处南朝都城建康近郊,石城位北来大族聚居的会稽地区;两地龕像之兴建,既为江南所仅有¹⁾,其主要造像又皆出自高僧规划,且同为皇室名士所赞助,因可推知此两处主要佛像——无量寿佛和弥勒成佛之像,应是当时南方佛教信徒所尊奉的重要形像。现略辑有关资料,以窥无量寿与弥勒信仰在南方的传布与发展。

江南传播无量寿,至迟不晚于四世纪后半期。东晋太和六年(368年)支遁撰《阿弥陀佛赞序》云:“西方有国,国名安养……世有奉佛正戒,讽诵《阿弥陀经》,誓生彼国……遁生末踪,忝厕残迹,驰心神国,非所敢望,乃因近图立神表,仰瞻高仪”(《广弘明集》卷十五)。略晚于支遁的竺法旷,“寓居吴兴……以无量寿为净土之因……有众则讲,独处则诵……时沙门竺道邻造

1) 东晋南朝侨置琅琊郡于摄山及其迤西一带,摄山龕像创始人平原明僧绍泰始二年(466年)“淮北陷虏,乃南渡江”(《齐书》卷五四《高逸·明僧绍传》),后遂“隐居琅琊之摄山”;主持龕像之法度禅师“黄龙人,少出家,游学北土”(《高僧传》卷八《法度传》)。石城立禅室,首闻东崖异迹之昙光“未详何许人,少习禅业,晋永和初(345年)游于江东”(《高僧传》卷十一《帛僧光传》),经营像事之僧护“克意苦节,戒行严净”(《高僧传》卷十三《僧护传》)。与摄山、石城两像关系密切的僧祐,受业于法颖,“法颖姓索,敦煌人……研精律部……元嘉末(453年)下都……常习定闲房,亦时开律席”(《高僧传》卷十一《法颖传》)。可见此江南两处重要龕像之创始、设计、兴工、莹饰,除法护外,俱与中原北方颇有因缘,其中释子尤多精习禅业者。此问题殊值注意。

无量寿像，旷乃率其有缘起立大殿”（《高僧传》卷五《竺法旷传》）¹⁾。太元二十一年（396年）逝世的名士戴逵，生前曾精雕无量寿及其挟侍，唐初道世记其“委心积虑，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法苑珠林》卷十六）。庐山慧远更于元兴三年（404年），共“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高僧传》卷六《慧远传》引《刘遗民文》）。远公弟子僧济“诚要西国，想像弥陀……又请众僧夜集，为转《无量寿经》……因梦见自乘一烛，乘虚而行，睹无量寿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高僧传》卷六《僧济传》）。江南禅僧观念无量寿早于运公师弟者，尚有“大兴之末（321年），南游江左”的竺僧显，僧显“遇疾绵蔓，乃属想西方，心甚苦至，见无量寿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高僧传》卷十一《竺僧显传》）。宋齐以来，崇敬无量寿益盛。宋初东来高僧佛陀跋多罗、求那跋陀多皆重译《无量寿经》²⁾。璩良耶舍与僧含译《无量寿观》，述“净土之洪因，故沈吟嗟味，流通宋国”（《高僧传》卷三《璩良耶舍传》）。谢灵运《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有云：“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广弘明集》卷十五）³⁾。《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杂图像目》卷上录有《荆州沙门释僧亮造无量寿丈八金像记》，该像“以宋元嘉九年（432年）毕功，神表端严，威光伟曜，造像灵异，声传京师”（《法苑珠林》卷十五）⁴⁾。瓦官寺僧洪、祇洹寺惠敬、安乐寺道静亦各造无量寿像⁵⁾，而孝武帝所铸无量寿金像尤有名于世⁶⁾。其时，名僧奉诵《无量寿经》祈心安养者众，如花严寺僧宝、谢寺僧弘、僧畅、虎丘僧诠、江陵辛寺县鉴、欣平龙华寺道汪、蜀郡灵建寺汪琳等，皆著录于宝唱《名僧传》。“江陵又有释道海、北州释惠龛、东州释惠恭、淮南释县泓、东辕山释道广、弘农释道光等并愿生安养，临终祥瑞”，见录于《高僧传》卷七《县鉴传》。宝唱《比丘尼传》卷二还录有建福寺法盛尼“常愿生安养，谓同业县敬、县爱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王琰《冥祥记》又录宋梁郡慧木尼“夜中卧而诵习，梦到西方，见一浴池有芙蓉华，诸化生人列坐其中……后与同等共礼无量寿佛……梦往安养国。《冥祥记》还另记有：“元嘉初（424年），（魏世子）女……升座转读，声句清利，下启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寿国”；“宋葛济之，句容人，稚川后也。妻同郡纪氏……元嘉十三年（436年）方在机织，方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释筐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无量寿佛”⁷⁾和传世元嘉二十五年（448年）晋丰县□熊造无量寿石像，铭中所记愿生佛国⁸⁾等民间故事，更可说明无量寿佛信仰在南方已逐渐深入下层。《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

1) 《竺法旷传》记竺法旷“元兴元年（401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2) 《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新无量寿经二卷，永初二年（421年）于道场出，……晋安帝时，天竺禅师佛驮跋陀至江东，及宋初于庐山及京师译出”，“新无量寿经二卷，宋永初二于道场寺出。一录云于六合山出……宋孝武帝时，沙门释宝云于六合山寺译出”，“无量寿经一卷，阙……宋文帝时，天竺摩衍乘法师求那跋陀罗以元嘉中及孝武时宣出诸经，沙门释宝云及弟子菩提法勇传译”。《名僧传》记：“求那跋陀……元嘉二十三年（446年）谪王镇荆州，请与具行，安慈辛寺，更立殿房，即于寺内出……无量寿一卷”。宝唱书已佚，有日释宗性于文历二年（1235年，即南宋端平二年）摘录之《名僧传抄》传世。以下所引《名僧传》俱出此书。

3) 又见《艺文类聚》卷七六《内典》上。

4) 道世所录较《高僧传》卷十三《僧亮传》为详，疑出自前引《法苑杂缘原始集》所收之像记。

5) 以上诸僧事迹俱见《名僧传》。

6) 《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杂图像目》卷上录有“宋孝武帝造无量寿金像记第五”一目。

经录》中有《观无量寿经》一卷、《无量乐佛土经》一卷、《阿弥陀佛偈》一卷；又记未见经文的《生西方斋经》一卷，约皆齐梁间民间流传之本。此外，已见上文的竟陵王子良与其他齐室贵胄赞助摄山无量寿金像、竟陵王子良与其子巴陵王昭胄皆曾手写《无量寿经》³⁾和定林上寺超辨勤礼弥陀，灵基寺法明诵无量寿⁴⁾，沈约撰《弥陀佛铭》云：“于惟净土，既丽且庄……愿游彼国，晨翘暮想”，又撰《绣像题赞》云：“惟齐永明四年（486年）……第三皇孙所生陈夫人……敬因乐林寺主比丘尼释宝愿绣无量寿尊像一軀”（《广弘明集》卷十六）等，皆有关南齐无量寿信仰之记载者。肖梁事迹有：庐山道珍恒作弥陀业观⁵⁾；灵味寺宝亮⁶⁾、郢山寺道贵尼⁷⁾、交趾仙山释昙弘⁸⁾讲诵《无量寿》；公上琏舍宅建孝敬寺，愿生无量寿国⁹⁾；庾洗卒，空中唱己生弥陀净域¹⁰⁾；简文帝撰《弥陀佛像铭》；刘孝仪撰《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碑》¹¹⁾；而天监八年（509年）所铸光宅寺丈九无量寿金像，被号称为“自慈河以左，金像之最”（《高僧传》卷十三《法悦传》）¹²⁾。现存遗物有成都万佛寺所出“中大通五年（533年）……妙光为亡妹令玉尼敬造……石佛一丘……愿生西方无量寿国”（《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版5）。

南方流行弥勒信仰略与无量寿同时，支公亦撰《弥勒赞》，赞云：“大人轨玄度，弱丧升虚迁，师通资自废，释迦登幽闲。弥勒承神第，圣录载灵篇，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晃晃凝素姿，结跏曜芳莲……挺此四八姿，映蔚华林园”（《广弘明集》卷十五），华林园结跏弥勒应是下生成佛形象。《名僧传》记京师安乐寺僧受立弥勒精舍和蜀郡龙渊寺惠严造弥勒像¹³⁾，皆东晋故事。此外，义熙四年（418年）译经于道场寺的天竺僧佛驮跋陀罗，早年于罽宾即曾“誓至兜率，致敬弥勒”（《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荆州刺史王忱一门宗奉的上明寺竺僧辅亦“誓生兜率，仰瞻慈氏”（《高僧传》卷五《竺僧辅传》）；见重于临川王郁的长沙寺县戒“常诵弥勒名不辍口”（《高僧传》卷五《县戒传》），是晋世高僧敬重弥勒者亦颇不乏人。隆安三年（399年）法显、智严、宝云等两行，“于陀历国见金薄弥勒成佛像，整高八丈”（《名僧传》），义熙八年（412年），法显东返青州，次年抵建康，《水经注·泗水》记：“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

1) 以上《真祥记》文，皆引自《法苑珠林》卷十五。

2) 石像原为端方所藏，像铭著录于《陶斋藏石记》卷五。

3) 《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录《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自书经目录》有“无量寿经一部四卷”。又录《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法集·自写经目录》有“无量寿二部四卷”。

4) 超辨、法明事，俱见《名僧传》。

5) 见《续高僧传》卷十六本传。

6) 见《高僧传》卷八本传。

7) 见《比丘尼传》卷四本传。

8) 见《高僧传》卷十二本传。

9) 《古刻丛抄》录有《孝敬寺志》云：“大同六年（540年）……菩萨戒弟子公上琏奉为亡母杨叔女舍所居宅……皇帝□赞名孝敬寺……同生[西]方无量寿国”。

10) 见《梁书》卷五一《处士·庾洗传》。

11) 《艺文类聚》卷七六、七七《内典》引。

12) 《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杂图像目》卷下所列“光宅寺丈九无量寿金像记第九”一目，即指此像。

13) 《名僧传抄》卷末辑弥勒法缘事迹中有“僧受立弥勒精舍”、“惠严造弥勒事”两目。

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陸東巷塔中，其石尚光潔可愛”。龍華圖即繪彌勒于龍華園華林樹下成道之像。戴逵每制像，其子顛常共參虛，后顛為濟江夷造彌勒像，“觸手成妙，初不稽思，光顏圓滿……此像舊在會稽龍華寺”（《法苑珠林》卷十六）。像在龍華寺，疑顛所制亦彌勒成佛之像。此後，劉宋僧尼敬事彌勒者日眾，或造彌勒佛像¹⁾，或建彌勒精舍²⁾，或誦經彌勒屬念兜率³⁾，或夢睹彌勒⁴⁾，或見真容⁵⁾，或生兜率⁶⁾。傳世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劉國造彌勒銅像，是南方現存最早的彌勒造像⁷⁾。宋齊之際，龍華集會風行京師，故周顛撰《宋明皇帝初造龍華誓願文》，《出三藏記集》又著錄《京師諸邑造彌勒像三會記》、《齊竟陵文宣王龍華會記》⁸⁾。竟陵王肖子良《淨住子淨行法門·奉養僧田門》于“奉為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眾生敬禮十方一切僧寶”之後，即“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廣弘明集》卷二十七）。沈約《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記淨秀“見彌勒下生翹頭東城”（《廣弘明集》卷二十三）⁹⁾，沈約又撰有《彌勒贊》¹⁰⁾。齊末寶亮“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眾經，盛于京邑，講……《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咨稟門徒常盈數百”（《高僧傳》卷八《寶亮傳》）。《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錄有摘抄本《彌勒菩薩本願待時成佛經》，異出本《彌勒下生經》和未見經文的《彌勒受決經》、《彌勒作佛時經》等。同書卷五《新集疑經偽撰雜錄》又有《彌勒下教》。此諸宣揚彌勒成佛經本，約皆廣泛流行于民間。龍華三會以征下生，彌勒出世之說，自支公以來迄于齊梁，浸盛于江南，故宗懷《荆楚歲時記》述荆楚風物云：“荆楚以四月八日諸寺各設會，香湯浴佛，共作龍華會，以為彌勒下生之征也”（《歲華紀麗》卷二引）。廣贊彌勒下生，梁時已入荆楚民俗，前文所記自法度創始、僧祐經營之石城大像，雕作龍華三會之佛像形像，自有其深厚之社會基礎¹¹⁾。

- 1) 《名僧傳》記龍花寺道矯“元嘉十六年（439年）……造美學彌勒佛倚像一軀，高一丈六尺，神儀端嚴，開發信悟”。
- 2) 《名僧傳》記：“釋法祥精進有志節，以元嘉九年（432年）立彌勒精舍”。
- 3) 《比丘尼傳》卷二記宋廣陵中寺光靜尼“屬念兜率，心心相續”。《名僧傳抄》卷末有“（宋沃園寺）僧諮供給四事誦經彌勒事”一目。
- 4) 《名僧傳》：“曇斌……元嘉二年（425年）乃往江陵，憩于辛寺……夢見一人，白銀色，相好分明，似是彌勒，举手摩其頂”。
- 5) 《名僧傳》記宋成都香積寺道法“每至夕，輒脫衣于彌勒像前，養飽蚊虻，如是多年，後見彌勒放種種光”。
- 6) 《名僧傳》：“常元祖……深信大法，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卒。與其友人夢云：我從（道）汪法師受菩薩戒，今得生兜率天”。
- 7) 此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造彌勒銅像現藏美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神州國光集》十二著錄彌勒像銅座一，有銘云：“大宋泰始六年歲次庚戌（470年）……閔正玄夫妻敬造彌勒像一區”，座存像佚，不知此彌勒作何形象。又日本文青文庫藏一與弗利爾博物館所藏形制相似的坐佛銅像，有元嘉十四年（437年）銘，但銘中未記佛名。
- 8) 以上俱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雜緣原始集·龍華像會集目》。
- 9) 《比丘尼傳》卷四記禪林寺淨秀尼天監五年（506年）“告諸弟子：我升兜率天。言絕而卒”。
- 10) 收在《廣弘明集》卷十六《寺刹佛塔諸銘頌》中。
- 11) 有關齊梁信仰彌勒的記錄甚多，其例如《名僧傳》記安樂寺曇副“戒行清峻，唯至唯勤，乃通夢想，有人語之曰：若兜率之業已辦，無所慮也。又夢彌勒佛手摩其頂……齊建（武）四年（497年）卒”。《續高僧傳》卷五記梁揚都莊嚴寺僧曇曼“大通八年（534年）……卒于寺房……嘗造彌勒像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与之”。現存遺物除上述普通六年（525年）公孫伯城夫婦造彌勒佛倚坐銅像外，尚有大同四年（538年）陶遷造彌勒石像一例，見《支那美術史·雕塑篇》164頁。

南方崇信无量寿与弥勒,应予注意者,尚有同时敬奉两像之情况。支遁、沈约皆两像并赞;戴逵父子两像并雕;竟陵王肖子良两像并重;灵味寺宝亮既讲《无量寿》,亦讲《弥勒下生》;安公、慧远师弟一愿生兜率,一向往安养,俱见前文。《名僧传》记:“隆安中(397—401年), (惠精)疾病,口诵弥勒,未尝懈怠。弟子智生侍疾,问曰:何不愿生西方,而专呼弥勒。答曰:吾等道安八人先发誓愿,愿生兜率,而见弥勒,道愿悉以先见,唯吾尚存,欲遂本愿”。《法苑珠林》卷十六记:“晋世有谯国戴逵……作无量寿……三年方成……迎像入山阴灵宝寺。道俗观者皆先发菩提心。高平郗超闻而礼觐,遂撮香而誓曰:若使有常,复睹圣颜,如其无常,致令弥勒”。《比丘尼传》卷二记建福寺道琼尼“以元嘉八年(431年)大造形像,处处安置……瓦官寺弥勒行像一躯,宝盖瓔珞……又以元嘉十五年(438年)造金无量寿像”。《名僧传》记齐安乐寺昙副造“《无量寿》、《弥勒》、《四天王遗教》……各一千部”。又记江陵一僧曰:“由来愿生西方,得应之后,或有劝往兜率者。此僧嗟疑良久,至三更方决,云定向兜率”。传世梁大同三年(537年)弟子刘造像铭云:“愿生西方,面睹慈氏”¹⁾。《续高僧传》卷十七《陈南岳衡山释慧思传》记慧思“梦弥勒、弥陀说法开悟,故造二像并同供养,又梦随从弥勒与诸眷属同会龙华”。可见自晋迄陈,南方信奉无量寿与弥勒并无门户之分。故四川茂县所出齐永明元年(483年)西凉曹比丘释玄嵩造像碑,一面铸无量寿坐像,另面雕弥勒佛立像²⁾,其铭云:“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尚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愿一切群生发弘旷心,明信三宝,重修十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嘉豫其昌,永去尘结,法身满足,广度一切,共成佛道。比丘释僧成埴□值□共成此□”³⁾。两像合刻一碑,当可证明南朝信徒认为兼奉无量寿、弥勒两像,不仅无矛盾,且更可广致饶益:死后到西方与今生会龙华可一并获得。因此,可以推知摄山、石城佛像题材虽异,而其功能却可相互补充,故“光宅、摄山大像(皆是无量寿像)、刻县石佛(弥勒像)等,并请(僧)祐经始准画仪则”(《高僧传》卷十一《僧祐传》),而祐皆精工其事。

(二) 南方信奉无量寿与弥勒的来源和南北佛教信仰的分途

南方佛教敬奉无量寿、弥勒俱源于中原。《无量寿经》,汉末安世高之初译与曹魏康僧铠、白

1) 《陶斋藏石记》卷五著录。

2) 参看《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附图1、2。1988年8月,余过成都,于四川省博物馆库房获睹原物,承袁曙光同志见告:该碑二十年代出土后,被植于茂汶土司衙署前,四十年代有妄人将此碑左右两侧击解,只留正背面佛像部分,偷运成都,案发,冯汉骥先生移石于四川民众教育馆,寻又觅得击解之左右两侧残石,亦运存该馆。四川民众教育馆即今四川省博物馆前身。现将中间佛像部分与两侧残石复合,略述其内容如下:碑正面上部雕千佛,其下雕帐饰,帐饰下为无量寿佛坐像,像座下方壺门内雕“比丘法爱”、“比丘法明”两供养像。背面帐饰下雕立于莲台上的弥勒佛立像;帐饰左上方雕山中坐禅,其下有“时镇主性庄丘□部亦值□福愿□□”铭一行。左侧面最上雕双佛,其下为山中坐禅像,再下为永明元年造像铭六行,再下为着冠垂缡饰交叉披帛之菩萨立像,最下雕山中禅僧。右侧面上方雕双佛,其下山中坐禅,群山左侧铸偈语两行,文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像灭为乐”,山中坐禅下方雕如左侧面之菩萨立像。

3) 据《石交录》卷二录又述录。

延之再译、三译，皆出洛阳⁹⁾。所以，早期往生净土之记载，亦出现于洛邑，如《冥祥记》所记：“晋阙公则，赵人也……晋武之世（265—290年），死于洛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转经，宵分闻空中有唱赞声，仰见一人，形器壮伟，仪服整丽，乃言曰：我是阙公则，今生西方安乐世界，与诸菩萨共来听经”（《法苑珠林》卷十六引）。著名译师竺法护大赉胡本还中夏，自太始二年（266年）迄永嘉二年（308年）于敦煌、长安、洛阳一线传译经文¹⁰⁾，其中除再译《无量寿经》外，还初译《弥勒成佛经》、《弥勒本愿经》¹¹⁾，净土幻境之传播与弥勒下生说之出现，护公之力为多。两晋之际，中原高僧南渡者众，与护同隐之于法兰¹²⁾及其高弟子法开、琅琊衣冠竺道潜等集于剡之石城山，帛尸梨蜜多罗止于建初寺，竺僧敷止于瓦官寺，邳人竺僧辅后憩荆州上明寺，生于长安之康僧渊立寺于豫章，俱名重于时者¹³⁾。中原巨匠道安，于兴宁三年（365年）河南骚乱之后，分张徒众：先使法和入蜀，又令竺法汰率弟子四十余人诣扬州，后又勉县翼下江陵¹⁴⁾。前秦建元十四年（378年），苻丕围襄阳，道安又遣法遇、昙徽、慧远等南趋江陵，慧远、慧持兄弟等数十人后停庐阜¹⁵⁾。初道安抵荆襄时，《法苑珠林》卷十三记：“东晋孝武宁康三年（375年）四月八日，襄阳檀溪寺沙门释道安盛德昭彰，擅声宇内，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明年季冬，严饰成就”。其后，《名僧传》又记：“苻坚遣使送外国金薄倚像，高七尺一躯，金坐像一躯，结珠弥勒像、织成像各一张¹⁶⁾……常与弟子法遇等以人”于弥勒像前立誓，愿同生兜率”。时安公已注意弥勒经之搜集，其失译经录¹⁷⁾中，尚录有《弥勒经》一卷，《弥勒当来生经》一卷¹⁸⁾。建元十五年（379年）苻丕克襄阳，道安西入长安，与赵整、竺佛念等护持译事，当时所译经安公序文或云：“得升兜率，与弥勒大士高谈”（《出三藏记集》卷十《僧伽罗刹经序》），或云：“集斯经已，人三昧定，如弹指顷，神升兜率”（同上书，卷《婆须蜜经序》）。安公弟子僧叡《毘摩罗诃提经义疏序》亦云：“先匠所以辍章遐慨，思决言于弥勒”（同上书卷八）。道安临终，“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安请问来生所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从以上事例，可见安公初抵襄荆尚无量寿、弥勒并

1) 《历代三宝记》卷五录魏高贵乡公世，西域沙门白延译《无量清静平等觉经》二卷，其下注文云：“第三出。与世高、康僧铠等所出《无量寿经》本同，文名少异。见竺道祖《晋世杂录》”。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竺法护》条。

3) 见《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

4) 见《法苑珠林》卷六三引《冥祥记》。

5) 以上诸人事迹俱见《高僧传》本传。

6) 事见《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竺法汰传》、《昙翼传》。

7) 以上诸人事迹俱见《高僧传》本传。

8)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记苻坚送诸像之后云：“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珞迭晖，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阈者莫不肃焉尽敬矣”。

9) “以人”，《名僧传》、《高僧传》卷五《昙戒传》皆作“八人”。

10) 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所收经，自汉光和已来迄于晋宁康三年（374年）。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八章《释道安·经典之整理》条。

11) 见《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

率,寻以译经故,乃转重弥勒。安公卒后十六年,即弘始三年(401年),鸠摩罗什至长安,姚兴为建译场,四方沙门不远万里而至者,《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谓有“三千余僧稟访精研,务穷幽旨”,其中多安公旧人¹⁾。罗什以“支(谦)”、竺(法护)所出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应……续出(大)小品……三十二部三百余卷”(《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其中有新译《无量寿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前两种俱出罗什抵长安之次年²⁾。按此三经内容涉及义理者少,罗什急于传译,当出自姚秦地区对无量寿佛与弥勒下生崇奉之需求。其时,佛驮跋陀罗同罗什共在长安大寺,罗什门下僧叡、昙鉴皆愿生安养;而佛驮跋陀罗及弟子智严则重弥勒;时止长安大寺祈心安养者,尚有凉州禅师慧绍之徒慧通³⁾,并为姚兴所敬重。弘始十五年(413年),罗什卒。后四年即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入关。次年,赫连勃勃陷长安,灭佛法⁴⁾,道安、罗什所聚名僧星散,慧叡及其弟子法护、慧严、竺道生、僧苞、僧异、僧因、道温、僧业、慧询等集于建康,慧观、僧弼、昙鉴等集于荆州,昙无成去淮南⁵⁾。其留于北方者,移向西秦、北凉。就学于关右之玄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时乞佛炽盛跨有陇西,西接凉土……(炽盛)崇(玄高)为国师。河南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原住长安大寺之昙摩流支于姚秦之末游化余方,“或云终于凉土”(《高僧传》卷二《昙摩流支传》)。蒙逊子兴国组织译经,所撰《优婆塞戒经后记》云:“太岁在丙寅(北凉玄始十五年,426年)……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凉州)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摩什译此在家菩萨戒……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遇弥勒”(《出三藏记集》卷九)。甘肃酒泉发现北凉承玄元年(428年)高善穆造石塔,塔上部雕出与过去七佛共一组之弥勒菩萨龕像⁶⁾,是现存纪年明确的最早弥勒菩萨形像;该塔塔柱部分雕有译于洛阳或长安之《十二因缘经》节文⁷⁾。

1) 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罗什在长安》条。

2) 《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记:“魏文帝时,支谦以吴主孙权黄武初(222年)至孙亮建兴中(252—253年)”译经三十六部,内有《阿弥陀经》二卷。

3) 《历代三宝记》卷八于罗什所译《无量寿经》一卷下注:“一名《阿弥陀经》,弘始四年(402年)二月八日出,是第五译,与支谦、康僧铠、白延、法护等出两卷者本同,文广略小异”。又于罗什译《弥勒成佛经》一卷下注:“弘始四年出,是第二译。与法护出者大同小异”。

4) 以上诸人事迹俱见《高僧传》本传。

5) 《魏书》卷一四《释老志》:“义真之去长安也,赫连屈丐追败之,道俗少长成见坑戮”。

6) 以上诸人事迹俱见《高僧传》本传。

7) 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8) 高善穆造石塔塔柱所雕经文,无标题,但新疆吐鲁番所出同类北凉宋庆造石塔,于经文之前铸经名为《佛说十二因缘经》。按该经北凉之前有四译,《出三藏记集》卷二录安世高、法护、罗什三译,《历代三宝记》卷四又录汉安玄于“灵帝末世,游贾洛阳,因遇佛调即共翻译”另一本“《断十二因缘经》一卷,亦云《阿含口解十二因缘》,亦直云《阿含口解经》”。以上四译俱佚。马世长同志曾于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结禁品》(僧伽提婆译本系以前秦昙摩难提初译为底本,故卷前仍冠道安为难提译本所撰之旧序)中,检出与北凉石塔相应之文字,但小有差异(马有校记,附前引王毅《北凉石塔》文中。因疑《增一阿含·结禁品》所收十二因缘部分,系袭用旧译《十二因缘经》而有所修改。至于袭用四译中的那一译本,现已无法考定。

与此相同之石塔,酒泉、敦煌还发现多座,其纪年有承玄二年(429年)、承阳二年(430年)、缘和三年(434年)、太缘二年(436年),皆北凉沮渠遗物¹⁾。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西奔高昌,六年(沮渠安周承平三年,445年)建弥勒菩萨像于高昌城内²⁾,高昌城中亦出有与上述形制相同雕有弥勒菩萨龕像和《十二因缘经》文之北凉石塔³⁾。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无量寿佛像,是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一六九窟第六龕之本尊塑像,塑像上方有墨书“无量寿佛”榜题,无量寿作右袒禅定坐相。该龕右壁绘“弥勒菩萨”立像和“释迦牟尼佛”立像。释迦右上方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⁴⁾。西秦、北凉之奉无量寿佛与弥勒或有毗邻之西域影响,但与前此之中原佛教亦当有密切关系⁵⁾。北魏始光三年(426年)下长安,太延五年(439年)陷凉州,其前一年,太武己“罢沙门年五十已下”者(《魏书》卷四《世祖纪》上),再二年(440年),因寇谦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以成太平真君”之仟言,改元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太武“亲至道坛,受符箓”(《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原佛教逐步进入厄运时期。五年(444年)下毁佛诏,七年(446年)“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魏书》卷四《世祖纪》下),“遂普灭佛法,分军四出烧掠寺舍……其窜逸者捕获泉斩”(《集古今佛道论衡》卷甲)。自太武陷凉之前,迄文成即位,十余年间,留居中原北方佛教信徒又一次陆续南迁。北凉沮渠京声奔宋,凉州释僧朗去荆,僧表、智猛、法成、慧览入蜀,昙超、法颖、僧侯、慧芬赴京(建康),玄畅南逃,僧远渡江⁶⁾,僧导先立寺于寿春,“虏灭佛法,沙门避难投之者数百”(《高僧传》卷七《僧导传》)。此次释氏南徙,范围之广、信徒之众,皆逾于以前。西晋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流传之佛教,在北魏领域内遂趋隐晦。迨兴安复法,北魏统治集团除求福田利益外,既沿续道武建国之初,视如来如当今天子之先志,“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又着重于“巡民教化”,“化恶为善”,“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且自延兴三年(473年)“沙门慧隐谋反”(《魏书》卷七《高祖纪》上)、太和四年(481年)“沙门法秀以妖术惑众,谋作乱于平城”(《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纪》一)以还,僧人起义不断于诸州,因此,北魏皇室对中原旧日向往安养境界和祈愿弥勒出世之信仰,当有所忌讳,予以排斥,其偶存者亦转人民间⁷⁾,于是,北魏佛教信仰之主流遂

1)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

2) 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中,原存承平三年(凉王大沮渠安周遗像记)碑,碑文有云:“弥勒菩萨控一乘以英驱,超二渐而玄诣……图法身之妙,证无生之玄,诚东教迷方者随真寡以遍兴,离本逐末者守影笃以致极”。该碑本世纪初为德人窃去。《西陲石刻录》收有该碑录文。

3) 见《Chotscho》,1913,图版60。

4) 参看《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图版21、28,日本平凡社,1986年。

5)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

6) 以上诸人事迹,除凉州释僧朗见《法苑珠林》卷五一外,俱见《高僧传》本传。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义学之南趋》条。

7) 民间信仰无量寿的遗迹,有传世和平五年(464年)孟姜造金铜无量寿坐像、太和六年(482年)铭无量寿立像两例。弥勒作佛像形式之传世遗物,有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荆申造金铜弥勒佛立像、和平元年(460年)比丘法亮造弥勒佛坐像铜板、延兴五年(474年)韩令姜造金铜弥勒佛立像。太和以降之弥勒佛像传世较多,参看日人松原三郎《北魏太和金铜佛的诸问题》、《北魏の郟县样式石雕》、《北魏正光样式の金铜佛》,三文收入《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

与上承中原佛教之南朝,不仅谈玄论义异趣,即尊奉之形象亦多分歧。

北魏皇室“凿仙窟以居禅”(《广弘明集》卷二九高允《鹿苑赋》),重视道行精勤,迁洛以后仍倡禅诵不辍¹⁾。因此,北方释徒遂多谋自身之解脱致力于禅观。禅观所需形像,主要是释迦、三世佛和作证之七佛、决疑之弥勒,以及修法华三昧所思念之释迦、多宝对坐与劝发之普贤²⁾。决疑之弥勒尚未成佛作菩萨装束,着冠饰缙,施颈饰、瓔珞,多交脚坐式之形象,如云冈、龙门诸窟龕中之雕像。此种形像与前述北凉石塔所雕之弥勒菩萨同;北凉石塔弥勒菩萨与七佛共现,而七佛题材亦为云冈、龙门所习见,且有弥勒菩萨龕楣中现示七佛者。以上情况,应是《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所记:“太延中(435—439年),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平城),沙门佛事皆俱东”之残存遗迹。弥勒菩萨像与弥勒佛像取意不同,前者处兜率内院敷演释问,后者已于龙华树下成道作会,普度人天。南北对弥勒的要求有别,故北方所奉之形像和南方流行的与佛像无异的坐像或立像有显著差异³⁾。南方流行之无量寿佛像,不见于北魏都洛以前之窟龕⁴⁾,云冈偶见之例,俱出迁洛之后⁵⁾;龙门出现无量寿龕已属孝明时期,且有与南方情况相同之无量寿弥勒并奉之例⁶⁾。可见中原北方对无量寿之崇敬并非植根于魏土,而是六世纪初期以后,接受流行无量寿信仰南方的影响。

三、南方龕像与北方窟像关系的探讨

(一) 南朝龕像与云冈窟像

无量寿佛与弥勒佛信仰盛于南方,但开凿窟龕与雕造大像则盛于北方。北方窟像源于西域,新疆以东现存年代明确之最早大型窟像,为北魏和平初(460年)于都城平城武州山即今山西大同云冈开始雕凿的昙曜五窟。南方最早的大型龕像即摄山、石城两处,其开始之年晚于昙曜五窟二十余年。此二十余年间,云冈昙曜五窟已大体完成,鹿野苑石窟和云冈第七、八双窟

1) 参看《洛阳伽蓝记》卷二记崇真寺比丘慧庵故事。

2) 参看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3期。

3) 北方传世之小型铜、石弥勒佛像皆远离平城流行于民间之作,不见于云冈,可见佛像型之弥勒造像不为北魏上层统治者所采用。又或以陕西省博物馆所藏皇兴五年(471年)弥勒交脚佛石像和曲阳所出正光四年(523年)弥勒倚坐佛石像为例,证明云冈交脚佛像、倚坐佛像皆是弥勒佛像,似尚可讨论;即使如此,交脚佛像并不见南方,传世倚坐佛像也为梁以前南方所未见。

4) 北方偶有民间铸造之无量寿小型铜像。参看405页注7)。

5) 云冈可以大体肯定之无量寿像,如铭中有“往生净土”的第四窟南壁正光口年(520—524年)为亡夫侍中平原太守造像龕、铭中有“愿往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的第十九窟西胁洞后壁延昌四年(515年)清信士元三造像龕和第三十八窟口右侧上方吴天恩造像铭中有“腾神净土”句等,皆雕造于北魏迁洛以后。

6) 龙门北魏龕铭中最早出现有关无量寿信仰者,是古阳洞正始五年(508年)比丘惠合造释迦龕,其铭云:“造释迦一区,愿往生西方”。龙门出现最早之无量寿龕,是古阳洞神龟三年(519年)清信士佛弟子杜永安所造龕,但该龕铭中又云:“弥勒三唱,恒登先首”。至于像铭相应之无量寿龕,以火烧洞正光三年(522年)公孙兴始所造龕为最早。

均已告竣,第九、十双窟、第十一窟等皆已开工¹⁾。平城如此巨大规模的窟像工程,自当声扬于当时流行佛教之东土,江左新创的摄山、石城龕像不能不受其启示,以情理度之:自北魏太武之初,南北使节即往还不绝²⁾,文成和平以来迄孝文前期尤呈盛况³⁾;自北南投之士始盛于太武末⁴⁾,献文皇兴三年(469年)掠去平城之青齐官民,更陆续南逃,房崇吉“停京师半岁乃南奔”(《魏书》卷四三《房法寿传·附从弟崇吉传》),刘闾慰“博识有才思,至延兴中(471—476年)南叛”(《魏书》卷四三《刘休宾传·附子文暉传》),刘法凤、法武⁵⁾兄弟随母入魏都“身充仆圉,齐永明四年(486年)二月逃还京师(建康)”(《六臣注文选》卷四三刘孝标《重答刘秣陵诏书》李善注引刘峻《自序》),皆是当时知名之士。因此,魏都平城情况,可以推测广传于江南,故永明六年(488年)沈约撰就之《宋书》,已录有北国礼俗;略晚之南朝著作为肖子显《齐书》卷五七《魏虜传》更记有献文居石窟寺和孝文尤精信佛教立浮图诸事,僧祐《出三藏记集》、道慧《宋齐录》俱书昙曜译经,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皆收有北魏僧传。以上诸书撰写时间,都不迟于梁武前期⁶⁾,其时,摄山、石城龕像竣工不久,后者或尚在凿铸之中。关于平城窟像可能影响南朝,刘法凤、法武羁留平城与南返事迹尤值注意⁷⁾。

《魏书》卷三四《刘休宾传》记:“休宾叔父旋之,其妻许氏,二子法凤、法武,而旋之早亡。东阳平,许氏携二子入国,孤贫不自立,并疏薄不伦,为时人所弃。母子皆出家为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选尽物望,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法凤兄弟无可收用,不蒙选授,后俱奔南。法武后改名孝标云⁸⁾。《出三藏记集》卷二记孝标在北时,曾为“西域三藏吉迦夜……共僧正释昙曜译出”《杂宝藏经》、《付法藏因缘传》、《方便心论》三经之笔受人。《历代三宝记》卷九又据道慧《宋齐录》,增录《称扬诸佛功德经》、《大方广菩萨十地经》两部;并记昙曜“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经传流通后贤,应使法藏住持无绝”,北台石窟寺即平城武州山石窟。以上资料,可以说明:(1)孝标兄弟皆曾参与平城佛事;(2)孝标又亲预昙曜译场,此事在道慧撰《宋齐录》

1)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与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I,日本平凡社,1989年。

2) 南北使节往还最早记录,见《魏书》卷四《世祖纪》上:“(始光二年,425年)夏四月,诏龙骧将军步堆、颺若仆射胡颺使于刘义隆”,“(三年,426年)八月……刘义隆遣使朝贡”。《宋书》不记此事。

3) 参看《魏书》卷五《高宗纪》、卷六《显祖纪》、卷七《高祖纪》。

4) 《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即北魏太武正平元年,451年)夏四月……索虜伪宁南将军鲁爽,中书郎鲁秀归顺”。此事不见《魏书》。

5) “法武”应作“法虎”,避唐讳改。参看中华排印本《魏书》卷四十三《校勘记》[六]。

6) 指梁武天监间(502—519年)。肖子显《齐书》约撰于天监末。《出三藏记集》所收经,最迟为天监四年(505年)所出《陀陀卫经》等三种。道慧《宋齐录》应不晚于《祐录》。天监九年(510年)宝唱发愿撰《名僧传》,十三年(514年)已就条例,见《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高僧传》慧皎自序云:“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终于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

7) 法凤、法武兄弟被羁平城事,陈垣先生于二十年代即予注意,撰《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刊《燕京学报》6期(1929),该文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

8) “尼”下脱“僧”字。参看中华排印本《魏书》卷四十三《校勘记》[七]。

9) 《北史》卷三九《刘休宾传》此句作“法武改名峻,字孝标”。

时,即巴传播江南¹⁾; (3)孝标参与译经的地点即今云冈。孝标笔受吉迦夜共昙曜译经之时间,《出三藏记集》和《历代三宝记》引《宋齐录》俱记在延兴二年(472年),此当是笔受之开始时期,由此可知,孝标在云冈之日,正值昙曜五窟和云冈第七、八双窟兴建之时。永明四年(486年)孝标南返,其时云冈第九、十双窟和第十一诸窟亦开凿多时。

“法凤自北归,改名孝庆,字仲昌。有幹略,齐末为兖州刺史。举兵应梁武,封余干男,历官显要”(《南史》卷四九《刘怀珍传附从父弟峻传》)。法武(孝标)南返改名峻,自以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梁书》卷五十《文学·刘峻传》),建武中(494—498年),崔慧景荐峻硕学²⁾,寻为豫州刺史肖遥欣所礼遇。天监初,梁武召入西省,与任昉、祖暕³⁾、贺玚等共投中秘。时注《世说》⁴⁾,多引佛书、僧传⁵⁾,曾与范云、沈约诸显要应策经史⁶⁾,博洽见忌。峻又率性而动,见嫌于梁武,故不任用。后与庾仲容同为安城王秀府佐,并以彊学名⁷⁾,时峻纂集《类苑》,未及毕已行于世⁸⁾。晚居东阳紫岩山,吴会人士多从其学⁹⁾,所居东接招提寺,峻躬行顶礼,询道哲人¹⁰⁾,《广弘明集》卷二四所录《孝标与举法师书》,或即撰于此时。从刘峻兄弟之经历、清望与所交游诸情况推之,平城武州山等地佛教盛迹之南传,刘氏弟兄应起重要中介作用。《梁书》卷五十《刘峻传》曾记峻南返不久,“竟陵王子良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用为南海王侍郎,不就”,是时,正是竟陵本人赞助摄山福业之时,摄山龛像之经营,成为峻所重视并望有所准划之意乎?石城大佛之兴工,峻适退居东阳,东阳地接剡溪,峻前注《世说》,对隐剡众贤如支遁、于法兰、竺道潜、阮裕、戴逵等人诸多留意¹¹⁾。峻既慕剡地名胜,又喜接释氏,且峻与创建北国窟像之昙曜的一段早年因缘亦为经划大像之僧祐所素悉,因

- 1) 《高僧传》著录齐道慧二:卷八庄严寺道慧卒于建元三年(481年),同卷何园寺道慧永明八年(492年)时已闻名。疑撰《宋齐录》者,或即其中之一。如无误,则孝标在北参与译经事,在其486年南返之初,甚至南返之前,即已名闻江南。
- 2) 昙曜在北台译经,始于和平三年(462年),见《历代三宝记》卷三。《文苑英华》卷一九七录刘孝标《出塞》诗一首:“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绝漠冲风急,交河夜月明。陷敌摧金鼓,摧锋扬旆旌,去去无终极,日暮动边声”,疑撰于陷北之时。
- 3) 见《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崔慰祖传》。
- 4) 见《广弘明集》卷三所收阮孝绪《七录序》。任昉,天监六年(509年)卒,《梁书》卷十四《任昉传》记:“初,昉立于士大夫间,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则厚其声名。及卒,诸子皆幼,人罕瞻仰之。平原刘孝标为著论(《广绝交书》)”,以申不平。
- 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卷四《文学》第47条《笺疏》[三]谓:“世说注”系奉梁武敕撰,撰年在天监六、七年间(507—508年)。
- 6) 刘注引佛书有《僧肇注维摩经》、《经叙》等,引僧传有《支遁别传》、《安和上传》、《张野远法师铭》、《高逸沙门传》、《名德沙门题目》等。
- 7) 见《南史》卷四九《刘怀珍传附从父弟峻传》。
- 8) 见《梁书》卷五十《文学·庾仲容传》。峻在安城王秀所,余嘉锡考在天监七年(508年)。
- 9) 见《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安城王秀传》。《类苑》见誉于时,见《艺文类聚》卷八七《内典》引《刘之遵与刘孝标书》。
- 10) 上述刘峻事迹,除已注出处者外,皆据《梁书》卷五十《文学·刘峻传》。
- 11) 见《广弘明集》卷二四所录刘孝标《东阳金华山楼志》。
- 12) 参看《世说新语》卷一《德行》、卷二《言语》、卷四《文学》、卷十八《豪逸》中有关诸条《刘注》。

此，近在咫尺之石城功德，峻岂能不闻不问而无往来¹⁾？遗憾的是，文献无征，只能姑存此疑耳。

(二) 南朝龕像与北齐龕像

摄山、石城龕像之兴建，可能受有北魏影响；当其竣工并驰誉江南之时²⁾，约亦反馈于北方。《北史》卷八《齐本纪》下记：

“(后主)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

此凿山成就之大佛，《法苑珠林》卷十四引《冥报拾遗》记唐高宗曾来瞻礼：

“显庆末年(660年)，(皇帝)巡幸并州共皇后……幸北谷开化寺，大像高二百尺，礼敬瞻睹，嗟叹希奇，大舍珍宝财物衣服，并诸妃嫔内官之人并各捐舍，并勅州官长史窦轨等，令速庄严备饰圣容，并开拓龕前地，务令宽广……”。

《嘉靖太原县志》卷五《集文》录五代后晋苏禹珪《重修蒙山开化庄严阁记》详记开凿与重修经过云³⁾：

“据传记：开化寺，北齐文宣帝天保末年(559年)凿石通蹊，依山刻像，式扬震德，用镇乾方……齐后主燃油万盞，光照宫内。仁寿元年(601年)(隋朝造大阁而庇尊像焉。仍改为净明寺。洎)唐高祖在藩邸时，至此寺瞻礼回，夜梦(化佛)满空，毫光数丈，登极之后，复改为开化寺。显庆二年(657)(高宗驾至，出左右行藏资缙宝玉崇严饰之。后会昌甲子岁(四年，844年)，敕废大阁，露尊像，雨滴风摧，仅六十载，化随消无，道有污隆明矣。乾宁二年(895年)武皇虎距并州，龙潜晋水……闲修讲武，上西山而指顾，登北礼于慈悲，痛望真身而受霜露，迺下令遣徒管内讲化，计口随钱收数百万缗，更有自施信财者不可胜计……自乙卯至己未(895—899年)，首尾五年，盖成大阁，兼妆佛像……至今五(十)载矣……高阁踞而圣仪馥，非国王大臣之力，其可再修乎。遇北平王镇临之五年也，疆境义安，人民丰足……暇日游西山，至开化寺焚香，见阁宇倾(敬，佛像)崩缺……遂舍俸钱，重修荐之……大晋开运二年(945年)七月十三日记……北平王食邑一万三千户，实食封二千二百户刘知远立石”⁴⁾。

《嘉靖县志》卷一《寺观》补记五代以后修葺事：

“宋淳化元年(990年)修释迦如来舍利塔二座，俱高二丈。元末(寺)废毁，止存僧房、舍利塔。国朝洪武

- 1) 刘峻撰《自叙》，尝自比汉冯衍云：“敬通值中兴明君而终不试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排斥当年……敬通有一子仲文首成名立，余同伯道永无血胤……敬通膺力方刚老而益壮，余有犬马之疾，溢死无时”(《梁书》卷五十《文学·刘峻传》)。又云：“以病乞骸骨，后隐东阳金华山”(《六臣注文选》卷四三刘孝标《重答刘秣陵诏书》李善注引)。撰《东阳金华山楼志》云：“爰泊二毛，得居岩穴……金华之首有紫岩山……予之葺宇实在斯焉”(《广弘明集》卷二四)。《梁书》本传末记：“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普通二年(521年)卒，年六十。门人谥曰玄靖先生”。综合记录，可知峻隐东阳当在晚年，依此推之，僧祐天监十二年迄十五年(513—516年)经营石城龕像时，峻年在五十二迄五十五之间，应是“吴会人士多从其学”之际。
- 2) 《广弘明集》卷三十录陈国君臣仞梅楼覆山寺之诗文。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记，智顛“陈太建七年(575年)秋七月，初入天台，历游山水……庆昙光之石龕”，遂于“北峰创立伽蓝”。于是，江表声望，就山请戒。《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顛传》又记，顛于陈亡后七年，即隋开皇十七年(595年)“端坐如定而卒于天台山巨石像前”。以上事迹为时虽已稍迟，但可窥摄山、石城皆南朝晚期之佛教胜地。
- 3) 《嘉靖太原县志》录文多有脱略，下面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系据《道光太原县志》卷十二《艺文》一录文补。
- 4) 《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三原字《太原府》五《寺观》引《太原志》记此寺云：“开化寺在本县西北一十五里，自北齐高阳(洋)天保二年(551年)乃凿石通蹊，依山刻像，遂状招提之境。至隋仁寿元年(601年)改净明寺。唐李渊留守河东，来游于此，受禅之后，复题额曰开化。至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刘知远始经营之，今废”。又引《元一统志》云：“(开化寺)有巨石佛。五代晋开运中，苏禹珪作北平王刘知远修阁记曰：以己俸完缮之。其阁高二百余尺。宋末毁废”。

十八年(1385年)晋恭王重建。有五代苏禹建、(元)王好古所撰碑”。

明以后,寺废墟毁,遂至无闻¹⁾。1980年,太原市普查地名,于蒙山北峰开化寺西北二里大肚崖发现此巨像遗迹²⁾,知原像系露顶开龕,头上半部和上肢皆已崩佚,自颈以下宽厚胸腹保存尚好(图版貳,2),大肚崖者,即因此胸腹遗存而得名。腹部以下半埋乱石中,但双腿下垂之倚坐形式尚清晰可辨。像两侧凿石有石孔,当是插置梁袱处。

北齐另一龕像位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东麓,依山雕造倚坐佛像,高约27米,头饰螺髻(图版貳,1),右掌高举作说法相。现复阁三层,系明以来重修³⁾。该像现存最早记录,是五代后周马去非所撰《周黎阳大伾山寺准勅不停废记》:

“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有缺落碑铭,载相续日月,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⁴⁾。

未记明确建年。元初王恽游大伾,曾记此像于《游东山记》中,文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

“至元辛巳岁(十八年,1281年)春三月,余按部黎阳,膏澍连朝,明日孟夏丙寅朔,天宇开霁,大伾堆阜,景风明澹,画如也。拉友人宋祺泊诸属吏囊笔载酒来游兹山……相与稽首弥勒尊像⁵⁾,其镌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为高齐所造无疑”。

秋涧多识古物,其说或可相信⁶⁾。

以上两躯倚佛,皆依山镌像,露顶开龕,并接构木阁,此种龕制,非中原北方旧有;而倚坐大像亦与石城弥勒原像相同。由此可知,北齐此两处新式龕像约同源於南朝。又浚县弥勒倚坐大佛螺发广颐,举右掌,皆与石城原像相似,揆之当时北方多效南朝之例,此浚县龕像亦有直接摹拟石城之可能。太原、浚县两像既与南朝关系密切,则隋唐时期各地雕塑之倚坐弥勒巨像循此而上溯,自有其中土之渊源。此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将另拟专文讨论。

后记:1988年9月,上海大学历史系许宛音同志出示栖霞寺大殿内供奉的高约2米的石佛坐像照片,俨然右袒巨制(图八)。按长江下游现存窟龕以外的南朝石佛,过去仅知苏州鲟溪

1) 自本世纪初起,国内外学人多据方志记录往寻此遗迹,皆无所获。日人关野贞、常盘大定曾以砂岩疏松,疑已于早年崩毁,见关野贞《天龙山石密》,刊《国华》32编375号(1921),该文后收《支那の建筑と艺术》,岩波书店,1941。

2) 参看王剑霓:《晋阳西山大佛遗迹找到了》,《地名知识》1983年2期。

3) 参看高同根等:《大伾山天宁寺》,《河南省文物志选稿》第四辑,1983年。

4) 此碑记现存天宁寺内,引文系据《浚县金石录》(附《嘉庆浚县志》后)卷上录文。

5) 《浚县金石录》所录宋元人题记,皆记此像为弥勒,如陈知存《谒弥勒像题名》云:“登大伾,谒弥勒像……政和四年(1114年)二月十二日”,不忽术《题名》:“至元壬申(九年,1272年)春二月鲁斋门人不忽术观大弥勒像”。

6) 王恽,卫州汲县人,博学善文,有治绩。至元大德间,“五任凤宅,三人翰林”(《王公儒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后序》)。恽留心乡邦文献,至元三年(1266年)纂《汲郡图志》。浚州,汲郡之东邻,黄河故道自汲东北行,迤大伾北折,大伾遗迹当为恽所素悉。至元丙子(十三年,1276年),恽在京,披阅中祕新收亡宋图书彝器,撰《博古要览》、《书画目录》,时朝廷“议典礼,考制度,咸究所长,同僚服之”(《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寻转官大河南北,重视搜访古迹,对石麟之考察尤多致意,检《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拜奠宣圣林墓》有“荒陵余石解”,卷十七《赵州石梁》有“华表亭亭拥石麟”,卷三四《昭庆陵》有“石麒麟撼动秋风”等诗句,卷十一《唐建昌陵石麟记》更详记仪凤元年(676年)所建石麟之形制。由此可知,王恽对当时中原地区所存北朝隋唐之石麟形制的变化有所了解,因此,王恽推断大伾山寺石麟年代,当非率尔妄论。至于嘉靖三十八年(1610年)《大伾山天宁寺重修三殿碑记》云:“有佛千二百年余”,嘉靖、万历两《浚县志》谓创于石勒,皆不足据。



图八 南京摄山栖霞寺大殿内左侧龕中的石像
(头部以下为新补,据1987年许宛音照片摹绘)

莲池庵旧藏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慧影造小型释迦坐像一例¹⁾,现忽有较大造像之发现,殊为重要,因有南下调查之议。1989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在长沙召开,遂邀马世长、许宛音两同志于会期之前再去摄山,并顺访刻溪。此行之详细报告,宛音同志将有专文刊布,现只录上述栖霞石佛情况和刻溪另一处千佛岩小岩洞两事,补作此文后记。

(一)栖霞寺石佛,现置于大殿左侧自北京迁来的清代佛龕内。承寺雪烦、圆湛两位大师见告:此像头部系寺旧藏,传出土于寺侧峪底;躯体则为近年南京艺术学院张祥水先生用石膏新作后着色仿旧。并云:张先生创造躯体时,曾参考了北方坐佛。于是,短颈宽肩和右袒服饰以及贴泥条式之衣纹等中原北方流行之形制,出自补作,可置不论。现就佛像头部造型考察,其长颜广颧颇与前述天监十二年(513年)迄十五年(516年)僧祐重新经营之刻溪石城大佛有相似处,也和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之中大通元年(529年)所造释迦石立像接近²⁾,是此佛头凿造时间约亦在肖梁之世。因此,我们怀疑该佛头或即唐高宗《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所记梁临川王宏于栖霞寺所造另一无量寿像之残迹。碑文云:

“及梁运载兴,锐心迴向,大林精舍,并事庄严。临川王裁剖竹符,宣化惟扬之境;言寻秦苑,心想拔茅之义。以天监一十五载(516年)造无量寿像一区,带地连光合高五丈。满月之瑞,湛珠镜以出云崖;聚日

1) 现藏上海市博物馆。该像曾著录于《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四、《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一和《荀学斋日记》丙集下等书。参看丁文光:《梁中大同元年造释迦石像》,《文物》1961年12期。此像雕螺髻与刻溪石城大佛同。

2) 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图版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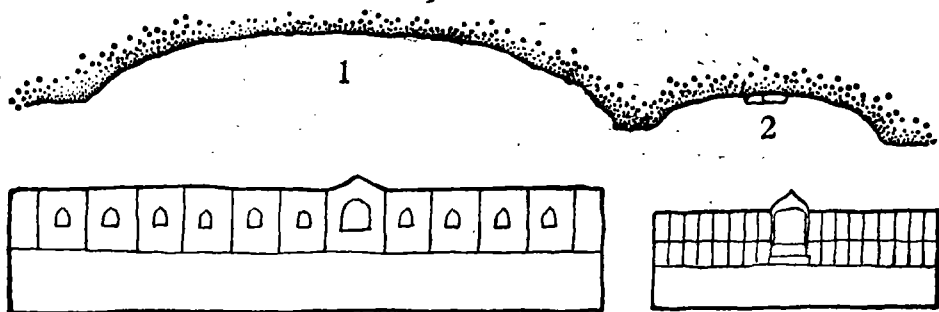
之辉，升壁轮而皎烟路。参差四注，周以鸟翅之房；迢递千寻，饰以鱼鳞之瓦。”

碑文明记此无量寿像被安置在四注瓦顶之精舍之中，显然与前引《江总碑》所记天监十年（511 年）临川王莹饰之龕像无关；之所以同时写入《明征君碑》者，当以该像供奉于明僧绍创建之栖霞佛寺之故。至于碑文所云“带地连光合高五丈”，当指从寺内平地算起，今除存头部外，躯体、佛座、背光以及原来地平皆已无存，因此所记“合高五丈”之数字，已难据实物核对。

（二）剡溪宝相寺龕像西北之千佛岩洞，据《万历新昌县志》卷十三记其地五代以还，名千佛院：

“千佛院，在三都石城山外，永明中（483—493 年）建。开运三年（946 年）赵仁爽重建，名千佛院。宋大中祥符（1008—1016 年）改七宝院。洪武十五年（1382 年）复名千佛院”。

该处有大小岩洞各一（图九），右侧之大洞已如前述。左侧之小洞与大洞布置相似，亦沿后壁雕



图九 新昌石城千佛院大小岩洞平面和后壁立面展开示意图
(1989 年速写)
1. 大岩洞 2. 小岩洞

佛龕，正中一较大释迦坐像龕，龕上莲瓣状（尖拱）龕楣尚清晰可辨。此龕之左雕千佛上下二列，每列九躯；右亦雕千佛二列，每列各八躯。此洞千佛形体较大洞者为大，服饰有通肩与双颌下垂两式。保存较完好的千佛，其垂下之衣裳整齐有致，与四川茂汶永明元年（483 年）造像相类¹⁾，前引《万历志》谓该院为永明中建，疑即指此两处千佛岩洞而言，盖修志时或有碑铭根据，现则遍觅两洞内外已无明以前的记录了²⁾。

1) 参看本文 402 页，注 2)。

2) 仅于大洞后壁左侧千佛龕下沿获嘉靖十五年（1536 年）重修铭记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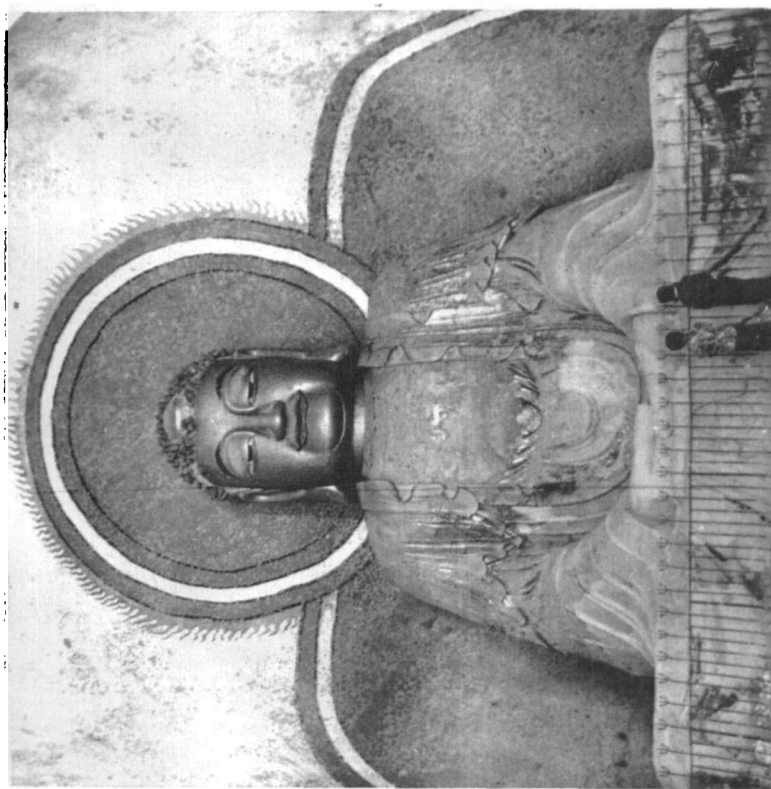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BUDDHISTIC NICHE STATU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y
Su Bai

Among the Buddhistic statue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AD)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AD) now only 2 remain as far as we know: one at Mount Qixia of Nanjing, the other at Mount Shicheng of Xinchang. Each of them is a large statue in a niche oval in cross section, cut out in a cliffside. The top of the niches was first cut through and then covered up with a wooden structure. There are no walls in the front of the niches. The statue at Mount Qixia has a stele erected by Jiang Zong of the Chen Dynasty and that at Mount Shicheng a stele by Liu Xie of the Liang Dynasty, reco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of the niche statue. The former statue is a seated image of Amitabha and was cut after 484 AD but before 497 or 500 AD; while the latter one, a reclining seated figure of Maitreya, its cutting works began in 494—497 and completed in 516 AD.

Amitabha and Maitreya were the Buddhas highly worshipped by the Buddhist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 worship began in southern China no later tha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4th century and spread down to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people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the following century. What is noteworthy is that equal stress was simultaneously laid on the worship of the two Buddhas in southern China. This may explain why the stele erected in 483 AD, unearthed in Maoxian County of Sichuan is engraved on one side with a seated image of Amitabha and on the other side with a standing figure of Maitreya. The worship of these two Buddhas would enable worshippers to go to the Pure Land of the West after death enjoying boundless happiness and wealthiness, and in this life to live in a world of prosperity and great peace. Although the subjects of worship were different, their functions we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 worship of the two Buddha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riginated from Luoyang and Chang'an in the 4th century and markedly differed from the worship in the Northern Wei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5th century when the imperial house encouraged the building of Buddhistic temples and the cutting of the statues of Trekalā Buddhas, Sakyamuni, Maitreya, Bodhisattvas and the Thousand Buddhas.

The cutting of caves and niches with large statues of various Buddhas in cliffides was started earlier in the Northern Wei than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ince the opening of grottoes at Pingcheng,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became more intensive. Therefore, it seem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iches with Buddhas' statues was star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th. In this respect the most remarkable records are the stories of Liu Xiaoqing and his brother Xiaobiao, both of them migh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the northern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that the niches and statues at Qixia and Shicheng exerted their own influence upon the Buddhistic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Northern Qi. The statue at Xishan Hill of Jinyang and that at Dapishan Hill of Junxian, being images of Maitreya in the same reclining seated posture, must have been modelled on the statue at Shic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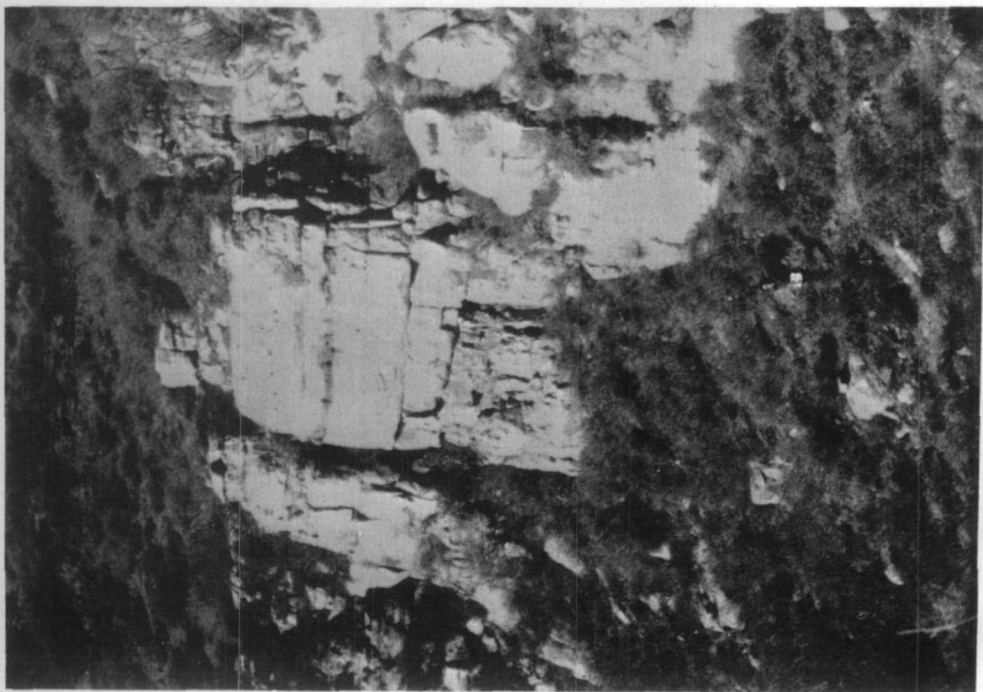


1. 新昌石城宝相寺弥勒大佛 (1980年潘表惠摄)

南朝龕像遗迹



2. 新昌石城宝相寺龕像前接连之五层阁殿
(1980年潘表惠摄)



2. 晋阳蒙山开化寺北齐倚坐大佛遗迹 (1984年摄)



1. 浚县大伾山大佛头部 (1977年安阳地区博物馆摄)